

本书作者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和具体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内涵,但其理论言说绝不仅仅限于贾平凹研究,其研究视野和深度全面辐射到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若干重大理论话题和争论,对“重写文学史”“中西文学观念和理论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表现、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等诸多方面综合贾平凹文化文学价值重新认识,给予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阐释和解读,形成了作者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整体性思考,其实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系统和经典话语历史进程的梳理和重建。



杨辉 著

# “大文学史”视域下的 贾平凹研究



人民出版社

# “大文学史”视域下的 贾平凹研究

杨辉 / 著

责任编辑:薛 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杨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1-017853-0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贾平凹-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7075 号

“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

DAWENXUESHI SHIYU XIA DE JIAPINGWA YANJIU

杨 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01-017853-0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杨辉

1979年生于陕西蓝田，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客座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著作《小说的智慧——以余华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历史文化散文《终南有仙真》等。编选《贾平凹文论集》（三卷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曾获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贾平凹文论研究”（立项编号：2014I26）

成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6M602175）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目录

Contents

## 绪论 “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 / 001

### 第一节 超越“现代性”视域 / 003

### 第二节 融通“大传统”与“小传统” / 009

## 第一章 文学史的“故事类型”与贾平凹评价的限度 / 017

### 第一节 文学史“重写”的限度 / 018

#### 一、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 / 020

#### 二、“寻根文学”的限制 / 021

#### 三、可以被“重写”的文学史 / 023

### 第二节 “宏大叙事”与“被遮蔽的意义” / 025

#### 一、文学史言说的难度 / 026

#### 二、规避“宏大叙事” / 028

#### 三、未曾“去蔽”的“意义” / 030

### 第三节 现代性与文化性情的感性迷醉 / 031

#### 一、“现代性”理论的局限 / 033

#### 二、《废都》与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 / 036

#### 三、“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抵牾 / 041

#### 第四节 文化困厄的审美救赎 / 045

##### 一、“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隐忧 / 046

##### 二、“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废都》现象” / 049

##### 三、文化困厄的审美救赎 / 057

##### 四、文学史的“故事类型” / 064

### 第二章 从中国文学“大传统”出发的思与言 / 067

#### 第一节 从“人”“地”之道到言“天”之境 / 067

##### 一、《周易》智慧与道家的历史阐释学 / 069

##### 二、崇阴尚柔与人物性格的复杂展开 / 076

##### 三、从“人”“地”之道到言“天”之境 / 083

#### 第二节 《红楼梦》“影响的焦虑”和境界的再生 / 089

##### 一、目光的“政治”和小说的伦理学 / 092

##### 二、“无限的实”，抑或“无限的虚” / 099

##### 三、生命悲感与时间之喻 / 108

##### 四、境界的再生 / 115

#### 第三节 文体、笔法与古典的遗韵 / 123

##### 一、作为文体家的小说家 / 124

##### 二、“闲笔”的意味 / 132

##### 三、古典传统的心性与韵致 / 137

#### 第四节 超越“启蒙”意义上的“乡土叙事” / 144

##### 一、超越“启蒙”意义上的“乡土叙事” / 146

##### 二、“中国之心”及其叙事话语 / 156

### 第三章 中国古典思想世界与文本境界的开显 / 163

#### 第一节 天人之际:《老生》与中国古典思想世界 / 163

- 一、历史叙事中的讽喻 / 164
- 二、民族本真形象的价值参照 / 171
- 三、天人之际 / 175

#### 第二节 “桃源”原型与道家美学 / 181

- 一、《老生》的闲笔 / 181
- 二、“桃源”的原始典型 / 183
- 三、无言而永在的“沉静” / 185

### 第四章 小说诗学的古典特征 / 193

#### 第一节 本土经验、现代意识与中国气派 / 193

- 一、融合本土经验与现代意识的文学自觉 / 194
- 二、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认同 / 199
- 三、中国经验与国家形象 / 204

#### 第二节 “水”与贾平凹的小说诗学 / 207

- 一、“水之性”与“文之道” / 209
- 二、“水”的诗学:苏东坡、沈从文和贾平凹 / 215

#### 第三节 “全息”与现实主义的可能 / 220

- 一、古典文脉接续的难度 / 221
- 二、《红楼梦》中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 / 224
- 三、《周易》精神与小说世界的生成 / 227
- 四、克服“古今中西之争”的局限 / 234

### 结语 贾平凹研究:向新的可能性敞开 / 239

- 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说明 / 239

二、贾平凹研究：一个延展性的论题 / 244

三、两个有待展开的重要论题 / 246

参考文献 / 249

一、专著类 / 249

二、论文类 / 259

后记 / 269

## 绪论 “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

自《废都》以降，论者在贾平凹作品评价上的分歧，内在地关联着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该问题因与彼时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存亡问题颇多勾连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败北”与西方文化的“胜出”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延续百年的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已然面临“危机”的境况下<sup>①</sup>，重新将“古今中西之争”所敞开的问题“历史化”，以回到此问题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与结构中，重新考量该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进一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梳理“五四”以来的知识谱系，以从根本性意义上应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影响的焦虑”，敞开新的问题论域，仍属文学理论界一个“未思”的领域。因是之故，围绕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甚至“晚近”的黄永玉、

---

<sup>①</sup> 此处的“现代性”危机，是指在西方现代性观念感召之下，以“弃绝”民族文化“传统”的决绝姿态迅猛发展起来的“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化在解决当下社会精神问题时的“无力”。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一旦脱离自晚清至“五四”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即不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相关联，其内在的“弊端”便逐渐显露。且不论“五四”诸公在引入“西学”时的“偏狭”（刘小枫、甘阳主编之《西学源流》以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两套书系百余种，目的之一即在于纠“五四”“西学”之“偏”），单是以西方现代性理论话语“检测”中国古典文学之价值及有效性，即无法真正敞开中国古代文化之核心精神。是为当下有志于重返“古典传统”的学人需要认真反思的重要问题。如不对自我的“前理解”做“先验批判”，即便进入古典文本，亦无从窥透其内在价值。黑格尔对《论语》评价的“偏见”即是一例。在这一问题上，佛朗索瓦·于连从“中国思想”回归“希腊思想”的运思方式可作参照，利奥·施特劳斯的释经学方法亦可有效规避此一问题。

金宇澄、木心<sup>①</sup>作品的价值论争，往往因论者操持不同之理论话语互相辩难，虽针锋相对，但收效甚微。如不对论者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做深入的“先验批判”，则此种论争难免“无功而返”，亦无助于文学史的调适和完善。而如何有效规避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局限，在更为宽泛的古今中西文化的语境下敞开新的评价视域，是文学理论界亟须应对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围绕“西方文论”的局限和中国文论建构问题的探讨几成显学，但仍未深度触及与此问题密切关联之“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论域<sup>②</sup>。为此，有必要引入现象学“悬置”的方法，暂时悬置“五四”以来以西方思想及文学观念为核心的文论的现代性话语的“优先”地位，并对其做价值的“先验批判”<sup>③</sup>。以此为基础，既能有效规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评价视域”上的“偏狭”，亦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归根复命”<sup>④</sup>的先决条件，不惟可以拓展贾平凹研究的新境界，亦可丰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史性叙述。

① 关于木心作品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论者知识谱系之内在分野，如何影响到作品的价值评判，亦表征着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局限性和在价值评定上的偏狭。木心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姑且不论，但其文学价值品性上承“五四”（“民国”）以及中国文学“大传统”，不在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传统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亦是需要论者认真辨析并深入反思的重要现象。详情可参见孙郁、张柠：《关于“木心”兼及当代文学评价的通信》，《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亦可参见孙郁：《木心之旅》，《读书》2007年第7期，李静：《“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② 近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张江“首开”的“西方文论”局限性的反思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朱立元、周宪、南帆等人亦围绕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张江对“西方文论”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在其长篇论文《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其以“强制阐释”及“场外征用”为核心，反思西方文论在文本阐释上的问题所在，并强调对文学文本做“本体诠释”，此一思路颇近于成中英教授的“本体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可参见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亦可参见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南帆：《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已被“历史化”的问题重新恢复其理论活力，已充分说明《周易》“复卦”返转回复观念的解释效力。

③ 对于“先验批判”及其运思方式，刘士林有极为精到的分析说明。可参见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④ 此为借用张志扬的说法，对该概念理论意义之详细辨析可参见张志扬：《归根复命——古典学的民族文化种姓》，《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 第一节 超越“现代性”视域

敞开文学理论的新视域的先决条件，是超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笔者与南帆先生围绕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的访谈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的核心论域：

问：诚如您在《文学理论：本土与开放》以及《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等文章中指出的，以“道”“气”“神韵”“风骨”“滋味”“以禅喻诗”等概念、术语、范畴和命题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论，在解释“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时的阐释效力远不及以国民性、阶级、典型、主体、无意识、结构等术语为基础的现代文论（核心是西方文论）。是为“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难题之一种。进而言之，您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至少包含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使现代人能够理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困难的是第二个步骤。解释之后，必须把它们放在整个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之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中加以考验，考察它们在这个语境之中解释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现代性理论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性”由来已久（就中国而言，现代性理论话语原本就是在反叛传统的基础上兴起的），以现代性话语为“检测系统”，会不会无法洞悉属于“前现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和解释效力？由此我想到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影响颇大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思想方式。因不满于马基雅维利以降的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思想路向，施特劳斯经由阿拉伯哲人重返希腊思想，以“返本开新”的学术姿态，重新梳理政治哲学的知识谱系。以此思路为参照，不知可否考虑这样一个思路：“悬搁”现代性话语及其所持存的“先验认知图式”或“前理解”，以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的理论姿态，重新思考本土语境下

的文学与文化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南帆：**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sup>①</sup>。如果暂时不考虑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这种命题对于主体、客体以及意向性结构等方面的特殊理解，那么，“面向事物本身”的姿态与上述关注“正在遭遇何种现实”是一致的。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所谓的“事物本身”或者“现实”绝非一个天造地设的自然之物。相反，我们所栖身的历史已经是一个文化构造物。无论是语言、风俗、社会制度还是建筑、交通工具、传播媒介，这些文化产品不仅构造了我们的现实，许多时候，它们就是“事物”或者“现实”本身。不管是企图观察这种现实、解读这种现实、延续这种现实或者摧毁这种现实，我们都要意识到，已有的各种文化传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博弈已经内在其中。

现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即是由现代性话语构造而成。而且，这种构造业已包含了现代性话语对于种种“前现代”话语体系的批判。现代性话语构造的现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众多思想家正在从各个角度给予反思。但是，如果反思的话语体系与现代性话语结构无法对话，甚至没有能力招架现代性话语的批判锋芒，那么，反思的效果相当可疑。这即是我将现代性话语作为“检测系统”的原因。“返本开新”可以成为一种学术姿态，但是，我们无法从传说之中的“桃花源”开始。所以，反思的话语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对话可能性是必要的前提。古人自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然而，我们真的还可以引用《论语》与互联网产生的各种问题相互对话吗？对于我提到的第一个步骤，准确地解释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成为首要的任务；可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衡量这个话语体系的现今意义。

---

<sup>①</sup> 关于“前问题”，可参见南帆、杨辉：《“关系与结构”中的文学和文化——南帆教授访谈》，《美文（上半月）》2014年第5期。

如南帆先生所言，之所以将现代性话语作为“检测系统”，是与现代性理论已经深度构造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及种种观念密不可分，重新反思现代性理论的“局限”，首先必须完成与现代性理论的“对话”，非此则无从建构新的话语。但前文所述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以现代性文论话语为“先验认知图式”，如何理解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自身”的意义？如宇文所安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中申论的：“‘五四’一代人对古典文学史进行重新诠释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不再受到任何疑问的标准，它告诉我们说，‘过去’真的已经结束了。几个传统型的学者还在，但是他们的著作远远不如那些追随‘五四’传统的批评家们那样具有广大的权威性。近时的文章开始探索那些被‘五四’文学史摒弃在外的领域，但是作这样的题目，作者们常常是用了道歉的语气，或者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来进行，并不宣称具有与‘五四’批评家们的判断背道而驰的重要内在价值。而且在这些领域里，学术界对于研究新的、没有人碰过的东西的要求，往往压倒了一个学者想做重大研究的欲望。”<sup>①</sup>一旦涉及学术“成规”的突破及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论者往往要面对巨大的压力。极而言之，文学史话语成规的潜在制约，使得任何选择不同于该“成规”的学术理路的研究将面对重重困难。对宇文所安以上反思的延伸，便是文学史叙述的如下限制：“如果我们在现实当中看看这一违背了‘五四’传统的别种传统，我们会发现这些书一般来说都是小字印行，使用的是繁体字，要不然就是没有评注”，这对于那些依赖白话注解和翻译来理解典籍的读者而言，“先验”地被剥夺了接受新的知识的可能。这也“给了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对这个过去的

① [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接触”<sup>①</sup>。此一现象无疑也是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历史反思的要义所在。作为一种叙事的历史，原本就潜存着叙述语法和价值偏好，若要敞开新的历史视域，则需要从叙述语法（历史叙事）的先验批判入手。舍此，则任何历史重述，都不可避免地会回到原有的解释框架之中。此亦为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基本学术理路。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程光炜领悟到海登·怀特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发现能够激活那些因为过于‘成熟’而陷于‘停滞’的专业学科的工作”。以“80年代文学”为例，对历史叙事建构的基本语境及语法的反思，可以将“80年代文学”重新“历史化”，在新的叙述语境的建构中完成对其文学史价值的重述<sup>②</sup>。

对此一问题，宇文所安提醒尚在“五四”以来的阐释框架之中解释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注意如下事实：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重写的语境中，“重新阐释过去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它和当时还很强大的古典传统是相辅相成的。”如今，作为彼时古典传统“重新阐释过去”的基本语境的社会现实已发生极大变化，如果还在“五四”一代人对古典传统的阐释范式中理解过去，则被“五四”诸公“连根拔除”的“古典传统”很难再有重现的机会。行文至此，有必要重温宇文所安在该文末尾处的如下质问：“‘五四’知识分子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斗争性叙事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免想要知道：当最大的敌人死掉之后，还剩下什么？”<sup>③</sup>虽未及对此说做更为深入的理

---

① [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② 程光炜：《发现历史的“故事类型”——读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此种研究理路的深度展开，可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亦可参见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论说明，宇文所安已经迫切地意识到要重新“召唤”过去，在“五四”一代人所形成的学术成规的叙事框架之中并无可能。孙郁在《新旧之间》一文中自谓，自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偶读《胡适文存》，方知“五四”那一代文化人，乃是深味国学的一族。其作品中有古诗文的奇气，并不与中国文学“大传统”（古典传统）彻底隔绝（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鲁迅、胡适、钱玄同，莫不如是）<sup>①</sup>。而到了他这一代，知识结构的先天局限，使得其与古典传统已隔绝甚深。“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已经读不懂古人，孙郁寄希望于年轻人对古典传统的“重新启动”<sup>②</sup>。这种重启的前提，是完成学术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在《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中，刘士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主义导致的是思想懒惰以及对观念创造的歧视，它们直接把某种带有现实功利性的‘论’，当作了最高的自明的先验判断范畴。”<sup>③</sup>以此为基础，论者疏于考辨自身所依凭之学术传统的内在局限，且无从对自身知识谱系作自我反思，其结果便是受制于既定话语的先验规定性，无从察知认知世界的多样化的可能。因此，“只有先验批判才能真正在逻辑上阻断各种独断论的产生，才能帮助这个古老的民族完成艰难的新生。”<sup>④</sup>“只有从各个知识领域清除掉历史积淀的精神废料，才能使中国文化启蒙获得一种坚实的理性基础。”<sup>⑤</sup>“悬置”“五四”以来的文化的现代性传统的用意，便是敞开一种新的可能。

思想界对此一问题的反思已有多年的。在为《“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所作的序言中，张志扬反复申论，将“中国人问题”与“犹

① 参见孙郁：《新旧之间·写作的叛徒》，海豚出版社2012年。

②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08页。

③ 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4页。

④ 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62页。

⑤ 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63页。

太人问题”对举，意在强调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其基本语境，仍然是晚清以降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在西方军事政治文化殖民的死亡胁迫之下，是否还有非西化的另类的走向自己民族文化的路？”张志扬的如是追问将“古今中西之争”再度“历史化”“问题化”。自鸦片战争始，长达一百七十余年的“救亡—启蒙”过程中，中国人遭遇的核心问题必然是：“救亡需要‘科学’（社会革命·生产力），启蒙需要‘民主’（国家革命·政治体制），因而归根结底‘救亡—启蒙’就是把中国从传统中拔出来转向西方道路指示的‘现代性’。”其根本问题在于，“不转向，中国亡；转向，中国同样亡，即同化追随于西方——名存实亡。”极而言之，在此一问题的背景下，“在西方的目光下”成为知识人运思的基本方式，“以至于中国人已长期陷入‘不能思乃至无思’的无能境地。”<sup>①</sup>基于对此一现象强烈的问题意识，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等作品均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应对这一问题。

如能超越“现代性”视域，并有效克服现代性理论话语及与之密切相关之文学史观念的偏狭，便不难发现，围绕贾平凹作品“落后”“守旧”及“反现代性”的批评，顿时失去了批判与解释的效力而变成“伪

---

① 张志扬：《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代前言）·“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第 3—4 页。可进一步参阅张志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近年来，刘小枫、甘阳先后主编《西学源流》数十种，《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百余种，根本用意，既在于纠“五四”以来国人对西学引入及理解的“偏狭”，亦在于从新的思想方法入手，重新阐释“西学”及中国“古典传统”。此亦为利奥·施特劳斯古典研究及其释经学方法的要义所在。刘小枫等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国内学界引进施特劳斯及施特劳学派作品，根本用意，恐怕亦在此处。其基本思路，集合在近期出版的以下诸书中：其一为程志敏、张文涛：《从古典重新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收入基本认同刘小枫学术理路之文章数十篇；其二为孙周兴、贾冬阳：《存在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张志扬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文集》，商务印书馆 2015 年。亦可参见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后者为施特劳斯古典学研究方式的“再解读”以及方法论探讨文章的合集。